

菊
陶菊隱著

菊
叢譚
天
亮
前
的
孤
島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版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版

◎ 陶隱 著
◎ 天亮的孤島 (全一冊)

◎ 定價 國幣 五元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陶 菊 隱

發行人 顧 櫛 森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菊叢
隱譚
天亮前的孤島目錄

上海無戰事	一
天堂變地獄	九
日本人的怪腦筋	一九
海上春秋	二九
人生四件大事	四〇
政治性的大恐怖	五〇
經濟性的大恐慌	六二
醜劇和惡劇	七七
風雨之夜	九一
編組保甲和防空	一〇四
人聲鼎沸宛若戰場	一一八
白人的災難	一三三

爐邊雜談	一四七
所謂配給制	一六三
又來一次大轉變	一七八
如此澈查	一九三
可悲的喜劇	二〇六
從上海望地中海	二二〇
一年不如一年	二三五
除三害運動	二五〇
黃金之謎	二六六
第一聲警報	二八一
再接再厲	二九六
清算三十三年	三一

菊隱 天亮前的孤島

上海無戰事

一、二八之前，上海在外形上雖不失其「孤島」的地位，但至多祇能諛之曰「愚人之天堂」，實在找不出一件使人愉快的事情來。我一直在想，四川菜有「紙包鷄」，上海局勢也許像是「紙包火」吧，那一團烈火早晚要把這個紙老虎燒掉。但是樂觀派不是這樣想，他們根據理智的分析，以為日本人無論怎樣傻，斷不會由對華侵略戰演變為對英美宣戰，由「泥足」進而把全身都投到泥海裏去。從事實觀察，當時的租界區內，偽鈔不能通用，偽府政令亦不能推行，除開無人一顧的漢奸報之外，各大報都在掛起洋旗來保持其嚴正的立場，一切情形都還過得去，因此懷着苟安心理的人士，都在做着「上海無戰事」「此間仍然是東方樂土」的美夢。

過去王克敏的「臨時政府」和梁鴻志的「維新政府」，都是奸字號老前輩，淪陷區人民統稱之曰「前漢」。汪精衛的偽府自然是「後漢」。許多奸醜們口頭上常常承認自己是「後漢」而靦然不以為恥。自「後漢」代「前漢」為日本人傀儡以來，人人切齒痛恨，因為前者遠不敵後者為惡之甚，後者有七十六號（偽特務機關）是殺人如麻的魔窟，人人談虎色變。

沒有七十六號，「後漢」能否成立是一個謎。日本人對華陷於苦戰，急求解脫之法，以便騰出一雙手來搶別的好東西。汪精衛離開重慶自然是日本人歡欣鼓舞的一件大事，想利用他做「李鴻章」，當初却並無扶植「後漢」的意思。

汪在黨國中的地位，以黨的副總裁，身兼國防會議副主席、中政會主席、參政會議長等要職，但是他的領袖慾常常使他不甘作第二人想，尤其奇怪的，他是一個文人，偏有「歪皮帶」迷，老想兼任行政院長和軍事委員長。他一生的過程中無論行動上或內心都是反蔣，其動機總不外不甘屈居一人之下之一念的所致。他是二十七年七月十九日秘密乘飛機離開重慶的，當天到昆明，翌日由昆明起飛到河內，二十九日發表響應近衛宣言的豔電。近衛宣言是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的。

汪想勾結日本，日本人也正想利用一個有名氣的人來拆中國的台。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汪坐上日本人所預備的北光丸從海防到上海來，五月六日在虬江碼頭登岸，日本人以江灣重光堂爲其下榻地，不久搬到百老匯大廈，這裏是他進行偽組織的大本營。汪黨先後到滬的有周佛海、梅思平、李聖五、高宗武、陶希聖、丁默邨、李士羣等。

汪向日本人大吹大擂，說他在黨中的地位如何重要，有了他，至少半數以上黨員會投奔到他的旗幟之下來，又誇稱他在軍隊中也有很大的潛勢力，至少可以拖來二十師軍隊。日本人聽得眉飛色舞，向之九十度鞠躬，稱之爲「東洋大大偉人」，是汪初到滬時最得意的時代。

是年六月汪飛往東京與當時的日本首相平沼見面。八月到廣州向中國軍隊播音，這是一種誘惑，略謂：「華軍如能停戰，日軍將自動讓出廣州作爲中日兩國的緩衝地帶，以便進行第二步停戰議和工作」。他自以爲他的辦法够聰明，殊不知在敵人占領區之內空口說着白話，莫說志堅金石的人不會爲他的巧言所動搖，卽乳臭小兒也決不會相信日本人字典中有「誠」之一字。這樣一來，汪的信用破了產，日本人對他已不復視爲「至寶」了。

但是另一套魔術救活了他的「政治前途」，那就是七十六號之成立，使日本人感到汪黨之尚有作爲。七十六號敲

動了租界和當時所謂「中立區」的喪鐘，黑暗勢力開始由市區沿邊伸展到租界來，在界內公然放槍殺人而巡捕不敢問，以至此後敵憲兵公然進租界捉人而命巡捕爲之嚮導，造成了暗無天日的恐怖時代。

他們所欲加害的對象非必爲抗日派，舉凡社會稍知名之士其不甘同流合污的都在「可殺」名單之列。殺人越多，「歹徒」聲勢越大，日本人對他們「領袖」估價越高，是他們最大目的。果然日本人覺得這套戲法演得還不錯，不妨利用之以剷除租界內的抗日派，進而達到完全控制租界之目的。

除開文化漢奸之外，新聞記者人人自危。後者是「歹徒」最大的目標，這理由很簡單，普通人對時事不妨竊竊私議，新聞記者却要搖動一支筆，白紙黑字把他們的言論發表出來；殺普通人不足以示威，殺新聞記者才是聳動社會的一件大事。這個時候我每天懷着一顆戰慄的心，不知道何日何時被人打死在十字街頭。我生平不保壽險，這時也不得不破例在寧紹人壽保險公司投了一萬元的壽險，照當時物價計算，這個數目僅能維持一家半年的生活費，我祇能做到那裏算那裏，別無百年長久之計。每天當出門之前，預先寫好遺囑，遺囑上卑之無甚高論，祇不過吩咐家人變賣東西或者找某某朋友暫時借貸以供家用一類的話。每當在電車站待車或下車時，先把眼光投射在四處，偵察有無形跡可疑的「歹徒」，或者提前一站下車，或者多走一站上車，並無固定地點，以免被人注意。我雖幸而未遭毒手，但是後來有人說，還是榜上有名（歹徒們的黑籍名單），是因同鄉人的關係而被剔除掉的。我個人的經驗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日本人看中了汪黨的搗亂手段，才有意思扶植「後漢」以代麻木不仁的「前漢」。汪有兩個建議，一要冒用「國府還都」名義，二要冒用黨國旗，前者日本人認爲可行，後者爭論了好幾次才答應在國旗上加一條黃色招記，以示與抗戰區有別。同時汪黨中人對所謂「還都」問題也有贊否兩派，反對派又提供兩個理由，比較自然一點的理由說：

「主和是可以的，在日本人占領區內公然組織政府，豈不變成了政治俘虜？」另一理由是所謂「日本通」者所看出來的：「你不肯上台時，他們（指敵人）有所求於你，叫你老子都成。一旦上了台，你的地位變成了有所求於他們了，你叫他們老子他們還不肯答應呢！」正在談論間，陳璧君從另一室鑽出來說：「你們莫多談了，曾仲鳴的血是白流的嗎？」此後即無人再倡反對論，但不久陶希聖走了，高宗武也失蹤了。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汪在愚園路召集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場通過議案推舉汪為偽「中執會主席」。汪又飛往青島南京等地與「前漢」兩個頭目（王克敏、梁鴻志）見面，九月二十一日發表談話恭維王、梁備至，好像說他們是淪陷區民衆的救星，和平運動的先知先覺。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汪在青島召集所謂聯席會議，出席者有汪黨褚民誼、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臨時」派即華北偽組織代表王揖唐、齊燮元、劉郁芬，「維新」派即華中偽組織代表梁鴻志、溫宗堯、陳羣、任援道等，蒙古偽「自治政府」代表李守信等，議決：（一）定於三月二十二日在南京成立偽「中央政治會議」，容納各黨各派，取消「興亞建國黨」及「大民會」；（二）定於三月三十日為偽府還都之期，取消「臨時」「維新」兩個偽政府。

五十八歲的汪剛剛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果然應了「日本通」的話，從此他有所求於日本人，不得不追隨「前漢」「先覺」們的步履叫日本人「老子」而向之作九十度鞠躬了。但是日本人需要「以華制華」的實際工作，不喜「鞠躬如也」，「前漢」的鞠躬技術不含糊，用不着「後漢」再來這一套。日本人心目中之實際工作就是「促進全面和平」，在汪的身上找不出答案來，乃認為是受了汪的愚，「把他捧上台，原來是個無用的東西」！汪也認為受了日本人的愚，「日本人何前恭而後倨也！」

吳稚暉罵汪「敗家精」，汪投日本是日本失敗的朕兆。這話說得一點不錯。「前漢」梁鴻志對汪也有一段恰當的批評：「王叔魯（克敏）在北京，日本人向他討十樣他還價五樣，結果討了八樣去。我在南京，日本人向我討十樣我還價八樣，結果討了十樣去。汪先生上台後日本人向他伸手討，他一口氣就獻給十樣，結果被日本人添兩樣拿了十二樣去。」

汪的內心恐怕也是一個「抗日派」吧，近數年以來我的耳朵裏裝滿了這一類的傳說，每逢三五漢奸背人聚談時都在痛罵日本人，希望天快亮，人人有「與日偕亡」之感。天字第一號漢奸也許正是極端的「抗日派」，因為他們知道的更多，受的氣更多，「當過漢奸亡八蛋再當漢奸」真是千古不朽的名言。推而至於淪陷區民衆其抗日情緒祇有超過內地民衆的，因為他們受敵人踐踏的機會多而所見所聞也比較真切的緣故。

自偽府「還都」到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爲期只有一年零八個月，德國在戰場上占絕對優勢，孤島的情形一天比一天壞，公共租界工部局對日本作種種讓步，一面擴大副總監渡正監（日本人）的職權，一面對日本人所爭的蘇州河北警權問題不惜成立新警區設日籍區長負責管理以遷就日本人的意見。這個時候租界名存實亡，看來孤島將淪爲茫茫苦海了。

每天起身，看報是一件大事。不看猶自可，看了更使人糊塗。從三十年十一月到十二月八日之前，不斷有使人提心弔胆的新聞。

美國駐滬陸戰隊奉令撤離上海之前，原定檢閱後巡遊市區，恐以此刺激四郊敵軍，臨時忽作罷。十一月二十八日美第四聯隊司令霍華德上校率領官兵四百五十名登美國郵船哈立遜總統號駛往菲律賓時，上海人像和老朋友

分手，都不無黯然惜別的情緒。

十一月三十日羅斯福總統縮短喬治亞州溫泉的假期突然回白宮，因遠東局勢緊張之故。

同日日本戰爭主犯而那時正坐在日本首相椅子上的東條英機大將，有「掃蕩英美在遠東勢力」「不許第三國干涉日本樹立東亞共榮圈計畫」一類的狂吠。

十二月一日英海相亞力山大宣稱：「英國增派戰艦赴遠東新加坡、香港一帶備戰。」翌日英艦隊一部急駛抵新加坡，有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在內。這消息不但香港市民聞之興奮，連遠在上海的人們也無不深喜英國人之能以「拳對拳」的新政策代替過去對侵略國一味低頭的「綏靖政策」。

同日港督下緊急令勸令人口疏散。日僑亦自港撤退至廣州。

駐滬英美總領事也在苦口婆心地勸他們僑民及時回國。截至十二月三日止，在滬美僑仍有二千五百人，包括美籍菲律賓人。三日英國撤僑專輪安慶號啓碇離滬，登輪者依依不捨，有的是情感作用，有的為產權關係。同時許多英美人士出售房地產和他們富麗堂皇的巨廈，商人紛紛結束業務，美商銀行通告各存戶自負存款安全之責。

美國揚子江艦隊韋克號從上游撤抵滬，艦長史密斯上尉於三分訪日本駐滬各艦長。

最可驚的是航運界消息，荷輪芝沙辣克號郵船甫抵滬，忽接港電，不及卸貨即於一日離滬。英國太古、怡和兩公司宣布停售客票，所有由港駛滬各輪均於途中召回，其在滬各輪均於三日下午一律開回港。從常識上判斷，不到最後關頭他們決不會如此張皇。那時除少數法輪外，上海與海洋交通祇有奇貨可居的三艘巴拿馬輪船馬拉松號、雷夢娜號、鮑亞卡號，但均載貨而不搭客。

消息雖然險惡，却依然不能改變樂觀論者一向所持的論調。他們相信備戰是弭戰方法，祇有英美不示弱才能壓低日本軍人的氣餒，並引來栖赴美一事（日本加派來栖為專使，十一月十五日飛抵美國，協助當時的日本駐美大使野村進行美日談判）為日本外強中乾的鐵證。直到一二八之前夕他們尚引羅斯福總統致書日本天皇勸導和平一事為澄清時局的因素。

有幾家報紙也是百分之百的樂觀論者。他們常有這樣的見解：「美日戰事不可能，上海危機是經濟性的而非屬於軍事性的」。在當時複雜而惡劣之環境下，那些報紙旨在安定人心，其言不可盡信。也許執筆之士是職業的樂觀論者，其與私人談話時和搖筆為文的聲調完全兩樣。

偶從大街走，經濟危機觸目可見：這邊是窮人搶大餅，搶油條，吃的東西無一不搶，搶吃的東西無罪，巡捕不加干涉，路人也不忍加以制止的。那邊人行道上暈倒的是餓死了的死人，今天有張三，明天換了李四，他們已不再有鬥爭，也不再需要什麼了。前面亂糟糟地一字長蛇陣，一片哭聲，打罵聲，爭吵聲，是排隊買平價米的羣衆，負責彈壓的巡捕把他們當賤狗似的，無情的棍子雨點般打在他們的脊梁上。十三元一斗，還說什麼平價！拿錢來買米，還要挨打受氣！這一切都是「天堂」上所常見的淒慘畫圖。

十一月工部局禁止洋米運出界外，限價每石不得超過一百三十元，一面採取「竭澤而漁」的新對策，強制囤戶依照限價出清存米，違者驅逐出境。捕房大捉違限價米商，拉拉扯扯過市，人人都罵「米蛀蟲黑良心」，但米的黑市依然存在，米店偷偷地把碎米參入洋米內，把換來的整粒米送到黑市裏去。

強者捷足先得，弱者望洋（洋米）興嘆。那些排隊買米的人大多數都不是吃米的人，同樣把辛苦買到手的米送到

黑市裏，自己吃赤豆或雜糧充飢。同時巡捕們也找着了好機會，或把他們的姘婦強塞在隊伍的最前線，使她們後來居上，或自己從米店後門裏提出來大量的平價米同樣送往黑市，或把查圍戶當作「捉財神」而法幣源源到手。

工部局知道他們的善政產生了惡果，擬進行調查戶口以便平均分配，這便是後來辦理市民證和配給制的先聲。自十二月七日起洋米每人限購五斗（每石一三〇元），煤球每人限購半擔（每擔二十元），因此長蛇陣越排越長，黑市與官價距離越遠。

圍戶和跑單幫都是戰時的罪惡。但是我一直在想，上海和內地及海洋的交通線停頓了，人口日日多，消耗量日日增，來源日日少，不是大批「米蛀蟲」把米棧房早已堆得高高滿滿地，上海民食問題的嚴重性如何！後來敵人封鎖上海不許米糧運入，不是大批單幫客冒生命危險爬進鐵絲網偷偷運米糧進來，上海市民無論貧富都有絕糧之可能。這批人大有功於困在孤島上的數百萬同胞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另一個因素，中國人都有「積穀防荒」的傳統觀念，除開極貧者家無隔宿之糧外，普通家庭無不以備三五月的糧為居家必要條件，這些無可計數的「小國戶」至少和緩了一個時期的消耗量。

食的問題如此，其餘有關民生各問題容後再談。

天堂變地獄

三十年十二月上旬，上海一部份人士仍在估計美、日間不致發生戰事。他們的看法，美國在遠東無重大經濟利益，日本斷不敢向太平洋彼岸龐大的美國挑戰。雖然上海最安全的「美軍防區」已有人去樓空之感，（一般人初以為英、日戰事難免而美國將置身局外，上海公共租界將由美軍接管，所以美軍防區內的房租特別貴。）可是投機市場的「和平空氣」仍然極濃厚，黃金黑市價每條由二萬二千元暴落至一萬四千元，米每石黑市一百七十元。因有統制日用品的傳說，物價亦紛紛下洩。同時也有聰明的觀察家每從報紙上取得反證，如謂「米煤存底豐」而儲藏早空，「法幣穩定」而幣值日落，「上海無戰事」也許正是上海捲入戰爭漩渦的先兆吧！他們相信報紙的論調與事實適得其反。另有少數人則以為縱令美、日戰事難免，上海仍不失其為國際都市，將由中立國如瑞士、瑞典一類的國家組織所謂中立區以維繫界內之治安與繁榮。

七日下午我在友人家晚餐，談到時局前途，估計上海無嚴重問題的仍然不乏其人。我說：「日本發動蘆溝橋戰事和希特勒對歐洲的閃電戰，當初都是想以戰爭姿態達到不勞而獲之目的，而戰爭是離開理智的，隨時有弄假成真之可能。根據這看法，也許今晚睡一夜，明早爬起來又換了一個世界了」。

八日上午未明四時許，從床上聽得隆隆震耳的敵聲，我以為敵軍慣於演習示威，也許在上海近郊又來這一套。曙光甫啓的時候，飛機逐隊掠空而過，情形一步步緊張。友人錢君打電話報告我：「美、日已宣戰，汪精衛聲明與日本同甘共苦，駐滬美艦章克號已被俘，英磯艦白特爾號已被擊沉了」。

若干年以來，上海無戰事危險。一般酣歌醉舞恃租界爲護符的，今天還然方覺，這是上海人所上的第一課。從個人立場看，戰爭是一種災害，今後淪陷區人民將與亡國奴無異；但從國家及民族立場看，東西戰事合流，是中國抗戰勝利的一大關鍵。

細雨濛濛的早晨，我拖着沉重的脚步，由薩坡賽路一步步經鄭家木橋到漢口路新聞報館。沿途所見所聞，有不知其名的「日本陸海軍上海最高指揮官」的「安民」布告；敵軍由北四川路開入公共租界，沿愛多亞路自外灘起到大西路各要口放有步哨；蘇州河橋梁封鎖；法租界鐵門關閉；敵人接收公用事業，電車公共汽車停駛；兩租界交界處布置鐵絲網禁止行人通行。行人憂鬱的臉色和陰沉的天氣相配合，是敵人侵入租界後的第一個鏡頭。

走過鄭家木橋時，站在路北的日本步哨揮手令法越巡捕撤除他們所布置的障礙物，於是各色車輛和各色行人像潮水般湧進法租界來，很少向北走入公共租界的，理由很簡單，法租界未被接收，好像還是天堂中之最後的一片樂土。我們所見的敵哨有戴眼鏡的，有嘴上長着濃鬚的，都在橫槍而立，不動，也不開口說話。

我跨上報館的二層樓，看見平日喜道長安的幾位同人此時和陌生人一樣，彼此默默無聲，却又像有一種無言之互訴：「天黑了！上海完了！報館也完了！個人安全和家庭生活也都顧不到了！」

我急於到報館的原因，爲着過去兩三年來常常借中央社電台把我的一點點意見貢獻給最高當局，這本密電本連同內地友人寫給我與抗戰有關的信都鎖在報館的抽屜內。「美商」報館比無保障的家自然安全得多。但是到那天，這些紙頭倘被敵人發現，將被指爲「抗日」鐵證，隨時有被捕之可能。

當我走過漢口的時候，我想起報館已毀了，我想起我這個人成了孤島上的一隻孤鳥。

停在報館門口，跳下來一個日本軍人，是什麼「陸軍報道班」的高橋大尉。他斯斯文文地走上樓，口稱奉「日本駐華派遣軍上海陸軍報道部長」秋山中佐的命令，要報紙照常出版，一切人員照常工作。這是日本人在某一時期所慣於表演的「王道精神」，把偽善外貌掩蔽了本來的猙獰面目。我急忙打開抽屜，手上像突然地起了痙攣，把那些紙頭和一切未成篇幅文稿都用火燒掉了。

我微微吁了一口氣，悠然地走出報館，到晝錦里錦華湘繡莊訪友談天。坐下不久，忽見街頭有一隊黑色制服荷槍實彈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威武地向申、新兩報方面走去。一轉眼間，街上放了步哨，沿山東路、河南路、漢口路、福州路四周禁絕路人交通。那時我真有說不出的難過，就心兩報未離館的同人之安全。後來得到消息，敵陸軍想一手控制文化機關，海軍則以兩報在其防區內（西藏路以東至外灘為敵海軍防區），要劃歸他們管理。雙方爭論了些時，才決定由陸軍管理一年後再行讓渡給海軍。敵陸海不合作傳說已久，不料他們剛跨入上海舊租界的第一天，其裂痕便顯然地擺在我們的眼前，這樣不統一的國家焉有不敗之理！這又是我當時偶然觸發的愉悅心情。

當我回到寓所時（正午），日本哨兵已撤退，交通已恢復，兩租界電車分段駛行。街上萬頭攢動。上海表面姿態和往日並無區別。工部局宣稱：「要求日方協力行政、治安，並遵照日方意旨，執行原有職務」。關於公共租界及工部局地位，日本人的腦筋正如外間所傳要維持「國際都市」，利用工部局為傀儡，這是日本人掩耳盜鈴的故智，而他們自詡為靈巧的政治手腕。這個時候，希特勒祕使魏特曼從天津到了上海，下榻國際飯店，參加日方會議。他是極力主張維持「國際都市」之一人，尤其要保持法租界行政之完整，日本不能接收法租界不能說不是魏特曼暗中維護之所致。魏特曼的用心是很顯明的，不讓日本人獨占公共租界，將來德國人有平分秋色的機會，他視法國為德國之征服

國，保持法租界正是保全德國利益，不讓日本人吞下肚去。

天下事往往使人捉摸不到，德、日兩國爲盟邦，東西呼應，同惡相濟，日本對英、美宣戰正是德國求之不得的一件事；不料德國偏看不起這位盟友，從魏特曼對日本人的倨傲態度中充分地流露出來。我們從多方觀察，德國以日本侵華陷於長期戰爲不智，它所期待於日本的是大舉進攻蘇聯，而攻擊英、美反居其次。尚有一點亦爲德人所不喜，日本人所倡的「大亞洲主義」排斥白人在亞洲的勢力，德國也是白種人，頗不以日本人此種政策及宣傳爲然。事實上德國早已抱有征服全世界的野心，日本人想和他分擔「建設歐亞新秩序」的責任，在德國人看起來是一句狂妄無知的話。

不久日本人有將英、美戰俘游街的建議，亦因魏特曼之反對而中止。這也許是魏特曼不願白種人出乖露醜的動機。那個時候日本人對德國人表面上雖仍稱「兩個民族，一種力量」，暗中未嘗不切齒痛恨，尤其日本軍人提到德國便無不悻悻然形諸詞色：「亞洲是我們的世界，非亞洲民族那有發言權和決定權」！有些上海人引德國朋友以自重，或者把他們的產權帶上點德國關係，不料日本人待他們更惡劣，罵他們不該把德國壓在日本的頭上。

因各報停刊，一切消息茫然（此時漢奸報無人閱看）。有一件事流傳得很快，南京僞組織想乘機收回滬租界（他們事前或竟未知這次的變局），日方告以「莫動手，一切要維持一二八以前的姿態，不得有所更張」。僞司法行政部派僞員持僞令接收第一特區法院，被站在院門口的日本憲兵阻止，索閱接收證件，當面撕毀了他們的僞令。同日僞組織派來許多僞大員都碰了日本人的大釘子，一個個垂頭喪氣而返。

工部局照常工作，照常出布告，布告上署名的也是照常的幾個人。日方授意凡司法、銀行、報紙、學校及一切機

構均須維持原狀。有一個漢奸向人誇耀，日本憲兵本部設於國際大樓。他帶領上海銀行界「鉅子」晉謁該隊長國口大佐，國口劈頭罵他們過去不該支持法幣，拒受偽鈔，神色非常難看。「鉅子」們鞠躬致敬解釋種種困難後，國口忽然轉怒為喜說：「一切誤會都由於隔膜而起。以後面對面就沒有什麼不能諒解的問題了」。他承認保護各銀行，俾能提前復業。「鉅子」們唯唯鞠躬而退（各銀行於十日開門）。

關於法院問題，日本人授意想組織國際性的「上海特區臨時法庭」，祇須與工部局合作，不受偽組織之節制。公共租界「警務處」出了一張滑稽布告：「現欲與上海地方法院院長郭雲觀及該院書記官長查良鑑有所接洽。有人報告兩君住址者，當以一千元為酬」。

八日下午敵駐寧總部參謀長後宮中將來滬視察，看見工部局屋頂上未掛日本旗，不禁赫然震怒，口稱：「要辦人」。有人向他說明要維持「國際都市」的用意，他才點首稱善。

一二八這天發生許多稀奇古怪的事，我一時記不了許多。當中最特別一件，自敵軍踏進租界時起，絕對不許七十六號再在租界內殺人和捕人。過去偽特務機關的一切活動，誰都知道是出於日本人之指使的，意在擾亂租界治安和肅清所謂抗日份子。現在租界是日本人的租界了，反過來要維持租界治安。捕殺抗日份子日本憲兵可採取直接行動，偽特務機關淪為情報機關。另一件事，日軍部禁止日本人入租界，凡因事入界者須持有該部許可證，而虹口華人則不需此。漢奸們因此放出了一種獻媚日本人的流言：「日軍入租界，解放了中國人，而被壓迫的是日本人」。這正是日本人所慣演的「王道精神」，一時把偽善的外貌掩蔽了本來的猙獰面目。但祇是一時的，不久狐狸尾巴就要露出來。有一段笑話不知是否事實，當時竟轟傳全市。敵人侵占租界後派人監守電話局，每從電機中偷聽各人的談話。一